

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

A Study of the Social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教育与效率崇拜

——公立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

[美] 雷蒙德 E. 卡拉汉 著

Raymond E. Callahan

马焕灵 译 陈如平 刘宏博 校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教育与效率崇拜

——公立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

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

A Study of the Social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郑豪杰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效率崇拜：公立学校管理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 / (美) 卡拉汉著；马焕灵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1

书名原文：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 A Study of the Social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Schools
ISBN 978 - 7 - 5041 - 5359 - 3

I. ①教… II. ①卡…②马… III. ①公立学校 - 学校教育 - 研究 - 美国 IV. ①G57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132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3 - 6346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312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6.75	印 数	1—3 000 册
字 数	270 千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译版序

有幸为马焕灵博士翻译的《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作序。记得还在 20 多年前，我刚留校没几年，就受学校委派，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教育管理。有一学期，我选了一门研究生课程：“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史”。当时任课教师弗莱明（Thomas Fleming）教授开出了阅读书单，第一本就是雷蒙德 E. 卡拉汉的《教育与效率崇拜》。弗莱明教授对该书推崇备至，认为它不仅对美国学校管理的一段历史做了忠实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乃至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发展都有深刻影响。遵照弗莱明教授吩咐，我认真地通读了全书。读完后，虽然对该书价值的认识远比不上弗莱明教授深刻，但却被该书作者认真的写作态度、严谨的求证方法以及书中随处可见的翔实材料所征服了。当时我就想，将来回到国内，如果有机会，把该书翻译出来该有多好，一定对国内教育管理研究有很大帮助。一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幸运的是，沈阳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马焕灵博士将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7 年前，他被我校教育管理学院录取，成为我指导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博士生。

说起来也巧，由于被原来学校公派赴美做访问学者，他推迟入学了一年，于是我就写信给他，建议他在美期间一边听课，做点研究，一边抽空翻译该书。小马勤奋又有灵气，本科就是学英语的，研究生又是教育管理专业，有很好的翻译基础，他欣然允诺，因此就有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么一本译作。

长期以来，卡拉汉的这本书，在欧美教育管理学界享有很高盛誉。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它可以说是一部论述现代西方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影响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权威的著作。其理论、观点以及详尽史料，在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领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从其极高引用率就可得到证明。尽管该书已发表 40 多年，但一直到现在，它仍被视为西方教育管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该书的背景：20 世纪初的 1900 年到 1930 年，美国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全盛期，全国各地到处可见机器轰鸣，生产繁忙，生意兴隆，市场兴旺的景象。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商业意识越来越浓厚，商业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上帝。就像该书所引用的一句话：美国人的工作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商业习气不仅席卷了经济领域，也渗透到社会公共管理各个领域，诸如家庭、学校、医院、教堂甚至部队。配合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我们都知道，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作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之一，为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泰罗的理论，组织及其管理是有规律可循的，有科学方法可依的，管理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根本的原则和方法。例如，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劳资关系紧张、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浪费情况严重、生产效率有待提高等现象，泰罗就认为可以通过对工人劳动时间和动作的研究、职责分工、计件计酬等一系列管理方式，较好地加以解决。泰罗自信地声称，他所设计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称得上是管理上的一场革命，一场“心理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

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本来是针对企业而设计的，但在当时那种商业优先、效率至上的年代，这些思想和方法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学校。在《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了几乎可以找寻得到的种

种详尽史料，客观忠实地记载了当时美国学校如何受泰罗理论影响，全盘吸收这种商业优先、效率至上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

首先，效率主义的企业价值观成为学校办学和管理的指导思想。在本书中，作者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效率第一的思想当时完全左右了学校教育和管理。例如，许多研究人员把班级管理简单当成班级经营，以为班级管理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将美元作为衡量教育效率的唯一标尺，学校课程设置的选择，不是从学生的发展出发，而是从经营成本高低出发（如把不符合效率标准的古典语学科削减，增加那些成本低的学科）；成本核算推行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等等。作者认为，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汲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的思想，但却对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造成伤害。

其次，将学校与企业进行不适当的类比。本来学校与企业是性质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管理上应该各有特点，但是受科学管理思潮的影响，当时美国的很多学校把企业管理的方法不加选择地搬到学校之中，还贴上所谓科学管理的标签。例如，把学生看做教育事业的原材料，把教学设施比做工厂，把校董会和教职员的关系比做资方和劳方的关系，把教学形式比做生产方法等；为了充分利用资源，有学校视学校课桌椅为工厂不停运转的机器，大量延长学生学习时间，甚至取消学生休假；也有学校推行所谓的“葛雷制”，以期事半功倍、经济节约地组织教学活动；还有学校不适当地精减学校的后勤人员，让教师设大班，上大课，增加教学工作量，完全不顾班额的大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如此而已，使得学校领导者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管理的细枝末节上，而忽视了教育的最基本的育人目标和知识价值。

再次，反智和反知识主义思潮在社会上的蔓延。受商业意识的影响，加上泰罗理论的流传，整个美国社会对学校采取了一种不恰当的态度，把学校看做充满浪费，效率低下的场所。媒体上也充满了对学校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而在高等师范院校，学校管理学的教授们把研究目光只聚焦于学校的财务、市场机制、教育成本核算等，似乎学校管理纯粹是一个商业性问题。这样的研究，几乎失去了教育研究本来的意义。教育管理专业所培养的研究生也是满脑子商业意识，很难想象他们毕业后能以正确的价值取向领导学校。所有这一切，在作者看来，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管理的专业性质，取而代之的是反智主义倾向的盛行。

最后，学校管理人员专业地位日益软弱。从本书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

看到，在泰罗制成为管理时尚的年代，美国的学校仿佛雨后春笋般冒出大批“效率专家”，他们受相关组织或公众委派，进驻学校，以商人们特有的眼光和方式在学校里指手画脚，指责学校“效率低下”。他们照猫画虎地搬来了泰罗制，而全然不顾学校组织和学校教育的特点。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削弱了学校管理者的职业地位，致使相当一批地区督学、校长黯然失色离开学校。

作者总结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一些清醒的教育家的强烈反对下，加上经济大萧条带给人们的深刻反思，即过分依赖商业模式治理社会危害无穷，轰轰烈烈的教育管理效率化运动才告一段落。尽管如此，学校已元气大损，教育已遭到伤害，这种伤害所带来的不当影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发酵。

从整本书的基调来看，显然，作者对科学管理思潮影响美国学校那20多年的一段历史是持批评态度的。他甚至把美国学校管理史上的这段日子称做是一个“悲剧”（见本书最后一章），一个美国教育的悲剧。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忽视了学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区别，把学校教育彻底地商业化。不是说商业世界的观念在学校管理方面一点也不能借鉴，而是在于我们不能不加选择、不作批判地全盘照搬工商管理价值观和具体方法。“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在企业管理中或许是金科玉律，但对学校教育来说就行不通。这是因为，就培养人而言，“最大利润”是无法测量的，起码在学校学习期间难以测量，因为人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最低成本”却容易测量，只要节省开支就能做到。我们可以算出教育投入的多少，但教育的产出却有可能是一个永远的未知数。

在我看来，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很多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依然有启发意义。的确，学校不是工厂，学生也不是产品，不加分析地引进企业方法，必然违背教育的宗旨，将学校引入歧途。可惜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但美国有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连我们国人也有些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学校管理就只是资源有效利用问题，成本效率问题，而不是传授知识问题，启迪智慧问题。他们依然期望，学校用钱省省的，教师编制紧紧的，班级生额数满满的。与此同时，他们却愿意在盖高楼、修大路、造宾馆等其他方面投入巨资。其实，这里已不是单纯有没有资金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理念问题、价值问题，就像作者在本

书最后一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要求公共教育领域用钱一省再省，但“却可以在汽车的购买和经营方面投入于教育的三倍的资金”，这已根本“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作者的这些思考，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该书另一个特点，也是我最为敬佩的，是作者严格遵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论从史出，而不是观点先行。全书引用了大量详尽细致的历史材料，包括1900年到1930年间美国的新闻报道、杂志、书刊、政府的统计报告、学术会议论文、教育统计年鉴等，几乎每一个观点，每一条评论，都以坚实可靠的材料为依据。可以想见，为写该书，作者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查找资料。文献研究法的魅力，透过全书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使得其研究成果极具真实性和说服力。作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研究者包括我自己认真学习。我们有些教育研究，满篇都是深奥的概念、前瞻的理念、恢弘的观点、惊人的议论，却独缺具体翔实的论证材料，这样的研究，很难想象会有真正而恒久的学术价值。

作者卡拉汉（1921—2010）原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育学教授。他1948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博士学位。上大学前，他曾经当过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海军当过几年兵。大学毕业后还当过一年中学教师，后在美国Butler大学做助理教授，在华盛顿大学升任副教授、教授，还曾做过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美国教育史，在这一领域发表过多部学术专著。为写这本书，他前后花费了5年时间。他自己也承认，写这本书是艰难的，需要大量时间查找资料。不但写作不容易，出版也很困难。书稿写成后先后寄给6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出版商的理由是，该书不会畅销。其中一家出版社即纽约大学出版社告诉卡拉汉，纽约大学一位教育管理学的教授劝出版社不要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中的材料为教育家们广为熟知”。为了出版，作者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把原来800多页的初稿删减到400多页。最后，该书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看中，得以顺利出版。出版以后，立即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所反映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学校管理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其中既有有益的经验，也有发人深省的教训。鉴前人之兴衰，思

当今之得失，但愿本书的翻译出版，能为处在激烈震荡时代的中国教育及教育管理提供一份精神食粮。

吴志宏
于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年 11 月

英文版序

大约在 5 年前，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我的本意是想探究一下在教育管理中采用商业价值观和实践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我的调查显示，这始于 1900 年前后，到 1930 年时达至巅峰。调查还显示，在很多情况下，学校管理者们将自己视为企业管理者，或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学校经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学者或者教育哲学家。那么，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学校管理者会采纳商业价值观和实践，而且摆出一副经理人的姿态呢？教育不是生意，学校亦非工厂。当然，到 1910 年时，商业和教育（在大城市里）二者的运作规模已经相当之大，并产生了诸多庞大的组织，因此，人们试图从此机构借鉴观念和技术运用于彼机构，这已变得合理甚至正当。但是，有迹象表明，借鉴的范围过于宽泛，这种理论解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

我早已感到，对商业价值观和实践的采纳这一现象可以用文化传播过程理论来作简单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观念和价值一般来说是从在一种文化中地位高或权力大的团体流向地位较低或权力较小的团体的。到 1905 年，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所指出

的，商业是美国社会的国王，的确，1910年至1929年间（如果不是到现在的话），工商业团体在美国已经拥有了至高的地位和权力。另外，人们对美国教育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教育家是而且早已是相对地位低下而且权力较小的团体。因此，对于发现在教育中采用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我并没有真正感到奇怪。

出乎意料的是，不仅是工商业团体权力的影响程度之大，而且，一方面是美国文化中商业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程度之大，另一方面是教育家特别是学校管理者的极端软弱和脆弱的程度之大。我曾期望有更多的职业自治权，而现在学校管理者对施加于他们的任何要求究竟做出多少让步，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令我惊讶进而变得沮丧的是，我了解到学校管理者们作出决策或者被迫作出决策，并非从教育的立场出发，而是为了平息批评者，以保住自己在学校里的职位。

现在我认识到，自1900年以来美国教育所发生的很多变化，皆可以以我们教育家的极端脆弱性（即我们教育家面对公众批评和压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脆弱性）为基础找到解释，而这种脆弱性已被嵌入地方的支持和控制模式当中了。这在过去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这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这样，人们就可以预见到，在1957年首颗苏联卫星上天之后，学校管理者们对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开始高度重视科学和数学。人们还可以预见到，他们会欢迎并迅速采纳詹姆斯 B. 科南特（James B. Conant）关于改革高中的建议，由于他在这个国家中的崇高地位，他的建议促成了国防教育法。任何一位督学（superintendent）*，只要是说他采纳了科南特的建议，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他的学校系统早已照此运行多年，那么几乎就无懈可击。

问题之关键并不在于学校应该教授多少数学和科学课程，也不在于科南特的建议是否能够促进学校的进步，问题之关键在于当学校遭到批评的时候，软弱的学校管理者需要有所回应。回应的速度和本质要取决于批评的性质和力度。自1900年以来，这种批评和回应的模式在教育方面产生过有时积极有时又消极的变化，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对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来说，其

* 督学（superintendent），国内有些学者译为“教育局长”、“地方教育官员”、“教育总监”、“校监”等，其本意是地方教育行政主管，基本是由聘任制产生，具有一定教育财政和行政管理权，但比中国的“教育局长”权限要小得多——译注

基础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适的。至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不过是所谓的教育政治才能罢了。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这样一种运作方法不可能导致“满足社会的需求”，反而通常它会导致放弃教育领导的责任。

我思考了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考虑到它们对于学校管理的意义，我发现，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付出努力，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互相依赖的。其一，改变教育管理的性质和提高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质量；其二，我们需要寻求消除地方学区督学的极端软弱性的途径和方法。我想，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说明，到了我们开始采取苛刻和现实的眼光审视地方支持和控制模式的时候了。我们设想，这些安排可以使我们摆脱全能的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也有利于为地方提供创新和实验的机会。这些观点无论是否可行或有效，至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立法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管理者软弱性归咎于我们传统上学校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产税的方式，这需有根本的改变。只要教育工作者拿着刀对着他们的资金渠道迟疑不决，职业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解决教育家获得充分的职业自主权的问题，与他们具有才干，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赢得普通公众的尊重并愿意赋予这种自主权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要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和大学必须提高学校管理者的入学标准，必须提高其课程的质量。让那些学问低下的教育者取得自治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同样，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却把他们放到微不足道、岌岌可危、软弱无力的位置上，也是毫无意义的。美国人不会同意前者，更不能忍受后者。

此书能够面世，我要感谢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在学术领域，乔治·康茨（George S. Counts）、迪特里奇·格哈特（Dietrich Gerhard）和劳伦斯·扬纳康利（Laurence Iannaccone）给了我太多的帮助。乔治·康茨教会我如何考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其著作《美国的文化之路》（1930）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迪特里奇·格哈特不断提出关于工商业影响美国教育的起源问题，这些问题是我所不熟悉的，并且引发了我的研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回答他的大部分问题。在劳伦斯·扬纳康利的帮助下，我对自己的数据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对我们一直称为“敏感命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更是如此。我认为这些是本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非常感激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谢弗（Robert Schaefer）、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刘易斯·哈恩（Lewis Hahn）以及教育研究生院的同事们的支持和鼓励。当然我也从我的研究生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与沃伦·

巴顿 (Warren Button) 的长期讨论中,使我受益匪浅。

在为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能干而又热情的迈伦·泰罗 (Myron Taylor) 和代尔·多朴克 (Dale Doepke) 以及玛格丽特·怀特 (Margaret Wright)、玛瑞琳·威特德玛里琳·维特德 (Marilyn Vittert)、玛瑞里琳·莫德芙斯凯基 (Marilyn Moldafsky) 的帮助。与书稿有关的记录工作是由贝弗利·范·内斯特 (Beverly Van Nest) 完成的,感谢她的杰出工作和乐观态度。我还要感谢玛里琳·奥克 (Marilyn Aach)、珍妮·巴布 (Jeanine Baab)、塔克琳·艾尔斯 (Tacqueline Ayres) 以及卡罗尔·休格森 (Carol Huegsen)。感谢琼·赫西 (Joan Hesse) 和盖尔·戴蒙特 (Gail Dimont) 在成书的最后阶段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

我的妻子海伦·戴维森·卡拉汉 (Helen Davidson Callahan) 自始至终与我一起为本书付出了心血,对她的聪明才智和奉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目 录

1. 序幕：1900—1910	1
商业社会中的学校	5
为效率专家搭建舞台	14
2. 具有改革意识的美国人发现了效率专家	18
科学管理原则	24
科学管理机制	27
施密特，生铁和一流的工人	32
3. 效率时代初期的批判与回应	41
对教育与日俱增的批评：1911—1913	45
学校管理者的软弱性	51
管理人员对效率需求的反应	53
4. 美国教育家应用伟大的灵丹妙药	64
将美元作为衡量教育之尺度	66
管理与教育工人	76
5. 教育效率专家在行动	90
对学校的效率测量	94
学校调查	107

徒劳的异议	114
6. 教育中的“工厂制”——双部制学校	120
葛雷计划与科学管理	122
纽约故事	129
动机问题	133
7. 依据成本核算进行教学	139
利用档案和报告体现效率	144
教育成本核算	149
教育资产负债表和儿童核算	155
教育陷入文牍主义的陷阱	160
8. 新职业的出现	171
教育的统帅	172
大学的教育管理研究	179
学校“经理人员”的教育	187
极大的不安全感	195
通过职业“专家”寻找安全感	199
新“职业”——学校经理	206
9. 效率的后裔	211
向公众出售学校	213
教育服务站	216
教育中的大规模生产	222
本末倒置	230
10. 美国教育的悲剧	234
大扩散	238
美国自食恶果	244
展望未来	248

1. 序幕：1900—1910

在这个世纪之交，美国有理由为自己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教育机会平等的梦想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任何有能力和工作意愿的美国白人都可以得到好的教育以及职业培训。当然，学校离完美状态还相距甚远：教师严重缺乏，教室拥挤不堪，学校建筑和设施不足，黑人教育一直被忽视。但在高尚的教育观念指导下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产生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免费的公立学校业已建立起来了。

20 世纪前 25 年的美国教育传奇——一个教育管理者接受不适当的哲学的故事，一个机会失去的故事——从正在改变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和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各地的学校可以反映它们所在的文化以及对这一文化中的力量的反应，美国的公立学校，由于其组织、支持、控制形式的原因，在本质上软弱之至，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它们会很快作出反应。正如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工业化——使用机械力量来生产产品——与自由企业的经济哲学相适应，资本主义制度支持下的工业化在美国得到发展。

19 世纪后叶，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的丰富成就，而物质的反映为两大方面的进步，对 1900 年以后的美国社会和教育影响巨大。其中一个工商业声望和影响的上升，以及伴随而来的美国工商业价值观和实践的持续扩张。另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发起、由揭露丑闻的记者打先锋的改革运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和学校管理者的软弱性，为形成美国社会的某种状况做出了贡献，该状况能够解释弗雷德里克·泰罗

(Frederick Taylor) 科学管理制度的巨大作用以及工商业观念对 1911 年以后美国社会 and 教育的持续影响这一事实。

美国社会中商业家作为领导人物的迅速崛起，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出现，在那里，自由企业制度，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成就和支配地位的确立，切切实实地占有了优势地位。在富裕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和物质增长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如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约翰 D. 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J. P. 摩根 (J. P. Morgan)、爱德华 H. 哈里曼 (Edward H. Harriman) 等工业和金融巨头等，拥有巨大的财富。到 1900 年为止，这些人物已被同胞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很自然的，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包括使他们成功的经济哲学）都被广泛接受和敬仰。当然，由于人们接受商业哲学这么普遍，这已经被看成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了。卡尔文·库里奇 (Calvin Coolidge) 在 1925 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的工作就是经商”，用这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实不为过。

毫无疑问，他们的巨大财富足以可以解释正在走向领导阶层的商人和企业家所享有的声望，但是他们的高地位的形成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迈格费读者》(McGuffey Readers)。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成功是诚实和勤劳的结果的观念，还学到了成功更是“物质”上成功的观念；而且成功的典范往往是银行家或商人。1865 年后这种观念得到那些蛊惑人心的、宣扬物质成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流行杂志）的支持，这些作品为商业和商业价值大唱颂歌。有时这些材料出自影响力巨大的领导人如西奥多·罗斯福和安德鲁·卡内基等人之手，但大多是由记者和成功的职业作家如奥瑞森·马丁 (Orison Marden) 等人写的。

在 19—20 世纪之交，这些商业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对公立学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影响的范围却被改革运动的某些方面扩大了。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企业合并和财富集中；对国家自然资源的野蛮开发；政府腐败和效率低下；城市大规模扩张；城市里移民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最后，中产阶级担心美国会采取极端或者激进的办法应对这些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成长起来，而且已经成为现实，当然，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早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反应]。

处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确存在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普遍狂热